

蘇聯政治



今日世界叢書之十三

譯 莊伯陳

著 士博爾穆

在列寧主義中，本來目的與手段井然有別，主義與策略判然有分；但經過若干年的富國主政，弄到手段變成目的，呈現出淆然莫辨的狀況。如果蘇聯還有萬變不離，始終如一的目的，這目的顯然不是某種社會體制或主義藍圖的實現，而是他們領袖們的政權之維持與擴展。這才是他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來保持和完成的中心目的！

——穆爾博士

Nov 11/5

譯者序

本書爲美國哈佛大學蘇聯研究所 Russian Research Centre 所出版的第二本研究著作。書的全名是：『Soviet Politics--The Dilemma of Power』。意謂目的與手段的相妨。目的爲革命主義，手段爲政權。Dilemma 普通譯爲「兩難」，意謂顧此失彼，顧彼失此。爲簡明起見今譯稱爲「蘇聯政治」。

作者係一個治社會學的學者，具有高度的科學客觀精神，全書精義在末章（第十八章）結論及其蘊義。其餘各章，皆爲對事實的研究與論斷。其中第十三章論工業制度較弱，似對蘇聯經濟計劃制度，未能把握全貌。

對本書的評價，除從書的本身外，並可從作者的「研究說明」及蘇聯研究所所長克魯克洪博士評序舉要述釋探討之。克氏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人類學者，他所著的 *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是一部權威著作。

從最低限度來說，本書是客觀的科學的，作者的心思是非常細密的。

如世所知，美國前駐蘇大使肯南 George F. Kennan 是美國有名的蘇聯問題專家，是杜魯門圍堵政策的劃策者。他在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於一九四七和一九五一年發表了兩篇論文，譯者曾於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五期的今日半月刊提要譯述，稱之為「肯南的困蘇論和格蘇論」。茲將其附於本序之後，作為讀者批評本書的參攷材料。所應注意的是：肯南以政論家的身份立說，自然要有主張，作者以科學家的身份做研究，自然不必更且不宜有所主張。

如作者「研究說明」中指出，這是一個在社會科學內，提出了一個總命題（理想與行為的相互關係）一個相聯命題（被指導的社會改革其可能性與限度如何）而作取例的研究 case study。

譯文取自由行文式，對作者所引舉的史實有刪去有簡化，但以不影响其論據力量為準，

對作者的論點，完全忠實譯出。

譯者願引大哲杜威先生在其自由與文化一書中（一九三九年出版）兩句話，貢獻於留心研究蘇聯問題的讀者。

(1) For in spite of the wide use of purges, executions, concentration camps, deprivation of property and of means of livelihood, no regime can endure long in a country where a scientific spirit has once existed unless it has the support of the so called idealistic elements of the human constitution. (1) A social regime can come into enduring existence only as it satisfies some elements of human nature not previously afforded expression. 這些話本來是論德國希特勒的納粹政權的。意謂一個極權統治並不能專恃誅鋤與放逐，懾伏與箝制來維持統治，必其號召有足以引起對某種理想追求的共鳴，必其措施有足以發揮某種久抑不伸的輿情，然後能穩定其統治。這是從被統治的人心來剖析一個強暴政權之所以能顛興與屹立之道。如把這兩句的看法移來分析蘇聯，亦復恰恰中肯，而又與作者全書所着眼之處，互相呼應。

杜威的話，說出了蘇聯所憑藉以勃興的根基；肯南所論，指出了蘇聯潛伏着可能的「變」

與「潰」的種子。我們拿杜威的理解，肯南的推測來做背景去讀本書作者提出的各論點，才能幫助我們對蘇聯作進一步的研究。

然無論如何，本書的學術價值遠過於其實用價值。

附

肯南的困蘇論和格蘇論

一 序 言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這是說聖帝大舜不用兵去打那造反的苗族，却把他那盡美又盡善的舞樂大奏起來，足足奏了七十天，於是那些頑苗全被帝舜的文德所感動心悅誠服起來。「格」是洗心革面的「格」。

漢人偽造古文尚書在大禹謨中有這一樣誓猷理想。（全文看來，又像舜命禹征苗，禹却中途叛師「偃宮」迫舜讓位，不難是「陳橋兵變」的老祖宗，給漢儒粉飾捏造成了一段「德化兇頑」的美談。）數千年後，當清美蘇兩集團冰炭不相容的今日，却有美國務院設計委員會前主任肯南先生新近發表他的格

蘇論，其基本主張與「帝舜修德格有苗」如出一轍。五年前一九四七年夏，他以×的筆名發表過一篇因蘇論，透關精深立刻引起世界注目。其後社魯門援助希臘時所宣佈的因蘇政策，馬歇爾西歐經援計劃，大西洋軍事公約，以及去年艾其遜的樹立防共「強區」Area of Strength 的政策，其基本觀點，即爲肯南之困蘇論。今年四月他又來了一篇格蘇論，這完全是困蘇論的延續與引伸。新近艾其遜要國會的民主黨議員提一議案，對蘇聯人民表示友好，冀於蘇聯的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施以離間，便是實施肯南格蘇論的第一聲。

的確，肯南是美當局真真的國策顧問。他早負有智囊的盛譽，曾在蘇京美大使館當參事，自此精通蘇事，嫻習俄文。後返國務院，升助理國務卿主持設計。據說蘇事一切集中歸他研究，他對蘇聯一舉一動，必潛研其幕後動因，企圖，及可能的進展。對美所擬對策，必窮究其得失以及蘇方可能的反應。肯南有超人的慧眼，而賦性孤介，不樂俗務，近休假一年，暫過學府生活，誠美政幕中之「白衣者山人也。」

肯南以超絕的史識，湛研當今世變中之最中心問題。「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肯南則能振翮千仞，下視歷史的川原，去脈來龍，全入慧眼。「閉門造車，必不合轍。」肯南則虛心求實，堆積如山的報告，必一一整理爬疏，於淆然齊奏的萬端動貌，握其玄機。所著困蘇格蘇兩論，實爲彼十年苦功的結晶。

中國爲全世界史流的一角落，我們不能離開世局來空想如何建設新中國，因此肯南兩論，尤成本論壇的重要參考材料。方今憔悴於處政的人民，無情的歷史，無情的肯南兩論，或將案之於枯魚之肆，我們於此又不得不深明乎「自助者方得人助」之至理。能自助便發生了歷史的新動力。抗戰時期不能自助而等待勝利所以成了今日的不能自助，等待不堪想像的陰影之到臨。肯南之論，請毋尤焉。

困蘇論原名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格蘇論原名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uture* 均發表於美國的外交季刊。前者載一九四七年七月號，後者載一九五一年四月號。

一二 兩論的中心思想

「窮則變」，和「純暴力不能久存」這是肯南的中心思想。「飄風不崇朝，暴雨不終日，孰爲之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這是中國的政治哲理，恰恰即爲肯南兩論的中心信念。我們所習知的共產世界革命理論和由蘇聯據以造成的霸力，依肯南的看法，如果弄到處處碰壁，不能再展，他們理論的信念必然改觀，而霸力的本身，即隨而變質。所以美國祇要能够建立一道長圍——一條世界的萬里長城——把蘇聯的極權暴力圍困起來，弄得他每向外張，便碰着銅牆鐵壁，處處不逞，歷時既久，必然發生內變，方能適應這新環境，以求自存的延續。他說：「不論任何玄秘的運動，即使其爲自信受言

於天的運動，也禁不起無止境的挫折，他必須自行修改，來適應無可逃避的現實。克里姆林宮的運動更不能自成例外。」這是困蘇論的中心理想。美國必須以身作則，成為世界上自由正誼的樂園，歷時既久，這樣的福音，鐵幕也無法封鎖，一若「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的使蘇聯人民大家都知道同在地球上另一角落，果然還有這樣愛好和平尊崇人道的自由社會，從「力不得逞」的認識，轉到「生之可樂」的相安，得到「今乃大覺，羞前之爲」的大解放。這樣以身作則的「帝力誕敷文德」便是格蘇論的中心思想。倘使歷史所儲待人類的命運，終爲世界血戰，肯南又強調預定解救俄人的方案爲作戰目的，竭力宣傳，咸使聞知，俾成爲「弔民伐罪」的義戰。對於極權暴政的統治階層又強調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的主張。他對於這些無可奈何被迫脅從而作劊子手的分子，又說：「他們需要援助、指導及諒解，而不是譴責與教訓。」又大有「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的仁惻。

肯南對於格蘇論的論據，他說一半由於意見，一半由於信念。他所信念的有兩句最基本的話：（一）「凡基於人性中之罪惡與弱點的任何制度，不會有真正的穩固。There is no genuine stability in any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the evil and weakness in man's nature」（二）警察國家起於「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自怖狂潮，這狂潮是歷史上的偶然現象。使當時的社會受害無窮，然而「社會的本身不會永遠留滯於此的。因爲社會爲有機體，具有變化，自新及適應的等等特性 but society being something organic, marked by change and renewal and adjustment, will not remain this way indefin-

「rely」這兩句話，稱之爲信念可，稱之爲史識亦可。他又說變化是不能預測的，所以防蘇的一切實踐，如軍備外交等等不可稍懈。

他的格蘇論，還有一個要點，就是一個國家的重大改革必須爲自動的而不能由外國的勸導與壓迫的。因此美國所能給與蘇聯的影響祇是示範作用。既要示範作用，其致力之方，端在「盡其在我」。What we urge upon ourselves。他說：克里姆林宮的挑戰正天心佑美不惟使其淬厲奮發合作圖存，抑且以道德及政治領導責任加於其肩，此責任早爲歷史命運所以儲待吾人者敢不敬謹接受。」這又彷彿「四海困窮，曆數在躬」的責任感，不料儒家的王道政治意味，充滿了這國策智囊的靈魂。

三 困蘇論的要旨

他首先把蘇聯共產政權的性格，來一個歷史的分析，說明其爲（一）理論和（二）其所處境的產物。他所舉的共產主義者的馬列論據早爲我們所習知，不再贅述。他却很有趣味的引了大史家吉朋Gibbon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一段，說的是：「從情緒的鼓動到霸術的橫施誠極人心惟危之惡劇。本來有智慧的去會欺騙了自己，本來有善心的却會去愚弄了他人，固有的天良慊慊昏睡於一半自欺一半欺人的魅境去了，恰恰與古哲蘇格拉底所說的妖魔無異。」

至論處境，則一旦獲得政權的蘇共，以暴發戶的身份，爲數極少的集團而欲却持全國，自不得不大張獨裁的淫威，使其懾伏聽命。及至異己誅鋤淨盡之後，特務政治警察國家的局面已成騎虎難下之勢，則又不得不藉口國外之敵——所有各資本主義國家——日日以傾復蘇聯爲事，爲防奸計不得不繼續維持獨裁極權。這樣一來，以獨裁來做自保自固的私圖，表面上却說成爲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的聖責了。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以獨裁來確立革命政權者乃自然演變到以獨裁來自固其寶座，這是處境方面決定了政權性格的實錄。

這政權性格既半由理論半由處境長成之後，在動作方面便表現三種特徵，（一）根本敵視外界，時時刻刻提防外界的暗算，所以在國際交涉上，那一股刁鑽神秘無所不用其極，成了最難交易的怪物。（二）克里姆林宮的意旨，成了永遠不會錯的聖旨。因此鐵的紀律壓迫個個黨員絕對服從，有了「道德」上的根據。（三）這「聖旨」却又是十分講究隨機應變的權謀，所以史太林的權謀又變爲革命真理。列寧已經是最講究審慎的，最講究善變的，他們的信念認爲革命是必勝的，所以決不著急，冒險。反正機會多着呢，一時的迂迴退却沒關係。可是不論怎樣千迴百折，一遇有變可乘，決不放手，仍然着着進迫的。

因此，我們的對策，便要事事提防，處處不放鬆，來圍困他，使其無隙可乘，處處碰壁。假如能够圍困他到十年或十五年，這樣的緊箍咒，蘇聯便受不了。

蘇聯用了大力建設重工業，犧牲了民生工業的建設。這樣的強迫勞動，犧牲享用，實在已經弄到民不堪命。二次大戰的犧牲更使之水益深，火益熱。民衆在精神上及體力上已是疲乏不堪了。人類的忍受是有限度的，拚命去鞭策疲馬是鞭策不動的。雖然俄國人很有才能，可是現一代的俄國人已經是神疲力竭，繼起一代的青年，因為在這樣緊張情緒的不正常環境之下長成，一定影響他們成熟後的性格和成就。

史太林繼承列寧，還要鬥爭了十二年才能鞏固他的權威。因此在極權統治中大權能否安然移轉是絕對沒有把握的。已往俄國史上充滿了巧取豪奪的覆轍。

今天蘇聯所代表理想，其權力的光輝之照耀，雖蘇境愈遠的却愈燦爛，反之回到蘇境凡爲其警察暴力所及之處則黯然無色。大小說家曼湯馬有言，凡人造的制度，每每外表聲光最赫奕之際，即爲內部朽腐已達頂點之時。有如天空巨星，奇光耀眼，實際上千萬年前其星已滅，不過餘光今始入到人們眼簾耳。

這一篇的要旨，是說蘇聯本體不但已滿蓄了自敗的內力，築個長圓，加上緊箍咒，他便會爆裂。

四 格蘇論的要旨

這樣靜靜而日威脅人類的蘇聯，美國人都深惡而痛嫉，以爲早些將他打垮，早些可以安枕。肯南首先便提醒美國人，戰爭本身，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同時即使無戰爭，祇要假以時日，蘇聯的性格也會改變的，猙獰的面目也改樣的。最要緊的是：不但不要壓迫他，阻止他向好的方向變去，還要間接相幫，使其順利地趨於變善之途。

其次：（一）肯南說俄羅斯民族是有才能，有愛由自的天性與傳統的民族，是慈和好善能受苦受難來爲別人的民族，萬萬不要因恨惡他的政府，便連他的人民都錯認爲可惡的東西。一個民族和個人一樣，他價值偉大之處往往不是他自己認爲了不得之處。（二）一切政治制度，在理論價值上沒有絕對性的。他的有效或無效，有好處或沒有好處，完全要從他對於本來局面是否應該採取與及他對於所施用的社會環境是否適合來檢討的。因此，美國人不應該不實踐的，希望將來的俄國採用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希望他變好固然，但要從他歷史的延續性和民族的特異性來促進其可能的演變。（三）極權政體不是某一民族的特殊病徵，而是在任何民族都會發生的病理，不過受病的可能性，却各不相同而已。

然後他進論蘇聯極權恐怖的本身及其前途。他認爲這樣的制度雖隨俄國革命而發生，但俄國革命本身是另外一回事。俄國革命是有很深長的歷史根源，是極複雜的現象。至於極權恐怖，祇是當着革命的那一代的黨人，由於他們飽經挫折吃盡苦頭滿腔怨毒所創成的自衛鱗甲。（一爲了危機四伏，一有風吹草動，總要先下手爲強，所以殺心跟着疑心起）不論怎樣散疑種恨，那似乎已經兇狼成性的蘇聯的特

務，當着他捕人之際，他眼邊露出那莫可名言的畏懼，顯然表示他自己怕別人。到了第二代的執政者，他們沒有身受過革命的危險，胸中沒有這一股怨毒，因此這種反常的心理和性氣，是傳不了代的。因此，這種違反健全人性的警察特務，久而久之，不但人民受不了，連那玩弄這樣龐大的主人翁也膩到受不了。（肯南此論未免太樂觀了，既然坐上克里姆林宮不由你不疑心生暗鬼吧。）而且警察國家不是社會的本身，社會是有機體，常常變動，不斷翻新來求適應的。因此，肯南認為假以時日，總可以勝殘去殺。

他希望蘇聯怎樣變好呢？第（一）、廢止鐵幕，恢復國際間交通，不再怕人民與外國接觸。第（二）、不再強迫勞動，奴役工農。（第三）、不再奴使附庸國家。

如果大戰剷除，這三項便成為弔民伐罪的作戰目的。如不作戰，則相信蘇聯統治階級會漸漸轉變的，但他也強調說明，我們不能預測變化是怎樣的。

五 兩論的評價

因蘇聯建築在實際的觀察與研究，而格蘇論則帶有濃厚的信念成分。他的信念也就是他的史識，就是「純暴力不能久存」和「窮則變」這兩句斷語。

杜威先生曾說：沒有一個有生命的個體會自願自戕其生命的：沒有一個握權者肯自行放棄其權力的。蘇聯的極權個體其生命的要素何在？鐵幕、特務、理論以其他一切組織，是否已構成其生命的各要素。這些要素，是否可以放棄而不妨害其生命，是否有推陳出新的續命湯，是否有捨舊謀新的代替品，全是問題。

「純暴力不能久存」誠然是史識，但暴力之消滅往往由於被推倒革命。這便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後，實踐的政治家不能不有史識，但如泥於史識，便成書迂了。因此肯南的格蘇論，祇可做實踐政治家的參考品。「數文德，格有苗」不是不可能，這總不免是「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千載難逢，偶然一遇之事。換一句話說：騎上虎背的克姆林宮主人，怎肯放心下了虎背？願以此反質肯南先生。

作者「研究說明」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 及
佛大學蘇聯研究所所長克魯克洪博士 Dr. Clyde

Kluckhohn 評序舉要述釋

作者從人類歷史中提出一中心問題，作取例的研究 Case Study。問題是，理想怎樣影響人類行為；其所取之例是，列寧主義怎樣影響了蘇聯的政治行為。

在「研究說明」中，及作者和譯者通信中，作者再三強調他所持的客觀的科學的態度。關於這一點，應先加以解說。

人生而有適應生存的趨拒本能，由此而發生辨別決擇的理智，愛憎好惡的情感，各各就其所習的範疇，所處的境地，善其所善，惡其所惡。所謂人人皆有的是非之心，在實際生活上成爲一種不可分離的態度。善善惡惡的態度亦即所謂評價態度。評價態度雖爲實際生活——

尤以其中的實際政治——所必不可無，却又爲治學窮理所最忌的障礙。理卽爲事物物間的關係；如對所研究的對象，先存有愛憎好惡的成見橫亘胸中，則其對資料的選擇，對事物的解釋，常於有意無意中爲這一成見所左右。其所獲致的結論，又常於有意無意中將其預存成見，施以邏輯外衣的文飾，使其言之成理而已。這話，並不涵有非薄是非的意思。所要指出的是：明真相爲致知之事，爲科學範疇之事；辨是非爲處事之事，爲道德範疇之事。淆之則相妨而愈蔽，分之則相得而益彰。以聽訟決獄爲喻，明真相審案情爲檢察官之職，辨是非定判詞爲司法官之職，必如此，然後能盡事物之情，得事理之平也。近代社會科學之能步入長足的發展，其發軔，端在於嚴格地把評價的主觀態度擱在一邊，毋使其左右研究的取材與運思，所謂科學的訓練以此，所謂客觀的科學的治學態度準此。

對於理想與行爲間的關係，作者反對「單向進程」的因果說。他既不取馬克斯的經濟史觀，視經濟爲一切動因，貶思想爲動果之一；亦不取新近耶路大學諸什樂普教授 Prof. S.C. Northrop 之說，認思想爲一切行動的動因。作者認理想與行爲間，有交互的動作 Interaction，有交互的影響。因而他所研究的總命題，不僅爲「理想怎樣影響行爲」，而爲「理想與行爲的相互關係」。在本書內，他又把這總命題申說爲「在展覽中的理論體系和在展覽中